

法治视阈下的反法西斯战争

毛国辉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73)

摘要:以法治思维审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能给我们无穷的思索与启迪: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必然取得最后胜利;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彰显了法治的公平正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推动了现代法治的创新发展;革命根据地军事法制建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有力保障。

关键词:反法西斯战争;法治;军事法

中图分类号:K265;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5)03-0090-04

在现代社会,战争不仅是个政治问题、军事问题,同时也是法律问题。战争既受到国际法、国内法的约束,但又会破坏平时的法律制度,使部分权利受到限制或损害,战争还会为法治的发展注入新的立法动力和改进活力,以更好地适应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唤醒尘封的记忆,重读那些记录着战争伤痛与和平理想的法律文献,以法治思维重新审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伟大历史画卷时,我们收获的是太多的思索与启迪。

一、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任何战争性质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那么,应怎样判断战争的性质呢?当代主要有两种评价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法律标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43}。毛泽东也说过:“战争的性质是根据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2]468},认为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判明战争性质的主要标准。可见,从政治学角度区分战争性质,必须把握战争双方真正的政治目的这一关键问题。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侵略,制止分裂,或者为了摆脱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战争当然具有正义的性质。

从法理上说,战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是一致

的。国际法有关战争的规定主要见诸《非战公约》《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两种情况下可以合法使用武力:一是根据宪章第51条的规定,国家拥有抵抗他国武装进攻的自卫权利;二是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39条和第42条的规定,授权组织武装力量,履行集体安全职责。现代国际法把战争分为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一切以掠夺和奴役他国人民为目的而进行的侵略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而反对外来军事占领、武装挑衅、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的战争,目的在于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维护民族利益的反侵略战争则是正义战争。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牵涉利益、道德、伦理、法律等多种因素,只有将多重标准结合起来,才能对各种纷繁复杂的战争性质做出全面合理的评判。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等国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开始扶植法西斯主义,并加紧扩军备战,疯狂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多次挑起侵略战争。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更是大规模侵略全中国。1935年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进而又吞并捷克和斯洛伐克。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大举进攻苏联,9月打到莫斯科近郊。在24个月内德国法西斯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同年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毛国辉,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内攻占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与此同时,侵略者完全突破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彻底践踏国际公理与正义,泯灭人性地进行了最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化学毒气弹、细菌战频繁在亚洲使用,集中营、焚尸炉遍布欧洲,人类文明面临着毁灭的深渊。法西斯侵略的空前浩劫,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抗。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共同宣言》,正式形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打击下,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先后于1945年5月和8月宣布向同盟国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的败降和同盟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毫无疑问,德意日法西斯挑起的这场世界大战,是他们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奴役全世界人民的一场强盗战争,因而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的普遍谴责,在世界上陷于孤立。反法西斯战争则是这一时期热爱和平的人们与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暴力力量进行的坚决不妥协的斗争,是人类为捍卫自由、人权、独立而战的正义事业,是一场抗击侵略、恢复和平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进步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心向背,决定了战争必然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

二、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彰显了法治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精神和法治的灵魂。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美、英、法、苏四国在德国纽伦堡成立了战犯审判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代表则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至1948年11月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东京审判。这场被法学界称为“在文明世界的代言人与残存的邪恶头子之间展开的生死判决”,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对此后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警告,从而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

第一,实现了审判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人类历史上的战胜方对战败方的处理似乎都过于简单和草率。当时,尽管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联合国能够无须审判就处死纳粹罪犯,但是,这就违背了联合国通行的基本正义原

则。纳粹分子仅仅是被告,是不是战犯、是什么样的战犯要通过审理才能定夺。而且,在审理过程中还应该充分给被告人以申辩的机会。公正、有效的方式是运用法律手段,只有在审判之后,宣告这些罪犯有罪,才能最大限度地赢得公众的支持,赢得历史的尊重。正如大检察长杰克逊所坚持的,法庭就是为让罪犯服罪而设。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不能依靠强权,而必须依靠公平和正义。纽伦堡审判最终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在审判过程中,法庭共开庭403次,起诉方近百名证人提供了数十万证言证实被告有罪;辩护方22名律师向法庭提交的100多位证人的书面证明材料也达30万条之多^[38]。法庭审判从始至终,控、辩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体现了公正、人道、民主的精神。虽然审判过程很漫长,但因为有了公正的审判程序作保证,凡是在纽伦堡战犯法庭被判刑的,至今没有一个人需要改正或平反。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体现了正义不容破坏原则,符合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

第二,体现了“人类的理性与良知”的自然法学说。在纽伦堡审判法庭上,战犯们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或“反人道罪”等罪名,但这类罪名以前从来没有作为刑事犯罪在成文法上存在过。为此,审判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对“溯及既往的法律”的争辩。而这一问题的解答离不开对人类基本价值观和法哲学理念的判断。在这里,是否承认存在高于人定法的自然法,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当纳粹德国制定的人定法违反了自然法所包含的正义、公正等价值和原则时,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应坚决拒绝这些恶法的执行,否则就是不义。纳粹战犯执行了不义之法,就应受到自然法的审判和制裁。因为自然法是永恒存在的,没有法律溯及既往和管辖权的问题。可见,纽伦堡审判的法理依据是蕴涵着“人类的理性与良知”的自然法学说^[42],法庭站在人性、人类文明的高度开创性地定义了“违反和平罪”“危害人类罪”或“反人道罪”罪名,体现的正是人类共同的正义观。

第三,确立了战争犯罪责自负的刑事责任原则。按照传统国际法,国家不负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也不负刑事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法关于追究犯有战争罪行国家和个人责任的制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国家和代表国家决策的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战争罪责任。审判过程中,辩方律师认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哪国领袖因发动战争而接受审判的先例,因此指



控根本就没有法理基础。但法庭一致认为:绝对不允许那些曾经手握重权的罪犯以虚无的国家犯罪说为理由推卸罪责,逃脱审判。审判系统推翻了“服从命令说”这个最高统帅部为自己的战争罪行所作的狡辩,提出了有关于职责合法性与道义性等诸多法律及人类文明深层次的论题。对此,塔里夫·泰勒检察官指出:“那些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们即使宣称他们是穿着军装的军人,也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军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特殊的种族!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一旦失去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那么他们将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常判断。”^[5]从而突破了传统国际法惩罚国家而非个人的惯例,促进了正式确立战争犯罪的国际责任制度,使犯有罪行的战犯个人和国家都无法逃避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至今对其侵略行径并不服罪,甚至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战争罪行加以否定或美化。这是对中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公然蔑视,是对胜利国的公然挑衅,是对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其签署的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书的公然否定。这也说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法律清算还任重道远。

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推动了现代法治的创新发展

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大规模战争洗礼后,国际社会对法治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转折点,现代法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涵盖的领域不断拓宽,通过法律的规则之治,制止战争、制止残暴,弘扬人道精神,维护世界和平,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作为精神底蕴,成为法治发展的动力之源,促使战争法治、军事法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第一,制定《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形成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防止再次发生世界大战,战胜国曾于1920年1月成立了国际联盟。不过,由于这个国际组织的目的在于维护几个主要战胜国的既得利益,因而它日后在制止法西斯侵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中毫无作为。鉴于国际联盟的教训,国际社会意识到必须运用有效的国际机构,以联合力量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联合国的成立及《联合国宪章》就是这一理念的直接产物。宪章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

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发展”。《宪章》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法文献,是联合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的组织法,它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建立起一套完整、可行的运作机制,表达了使人类不再遭受战祸的决心。《宪章》还规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循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以及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等原则,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深刻认识到尊重和保护人权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保障。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激起了全世界有正义感人们的愤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人权保护成为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倡导和主持下,一大批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宣言、宪章、公约、协议等先后被制定,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由数十部国际人权法条约构成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无疑是人性在世界范围的解放,是人性的新觉醒,在世界人权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第三,促进军事法制融入现代法治理念,军事法制的作用日益显著。对于军事法制而言,20世纪是其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和关注的世纪,也是其获得重大发展的世纪。二战期间,主要国家特别是卷入战争的国家为了巩固国防,赢得战争胜利,颁布并实施了大量的军事法。战后,出于全面规范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各国制定的军事法律规范日益繁密,军事法调整范围不断扩大。比如,美国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制定并修改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美国国防生产法》《武装部队后备役法》《战略与重要物资储存法》等一系列军事法律规范,并开始建立专门军事法律服务机构,一方面在作战中向军队指挥员提供法律知识,协助其决策;另一方面向官兵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6],还向全军发放《军官手册》《军士手册》《士兵手册》。可以说,“从近代的军事法制发展史来看,世界各国的军事法最初主要是针对军人并在军队范围内实施的。但是在现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各国军事法的日益完备,它的调整范围涉及到了整个国防、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国际军事和战争领域。”^{[7]99}到20世纪末期,军事法制的作用已经涉及军队建设和作战的各个方面。

四、革命根据地军事法制建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有力保障

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先后践踏了中国大片土地,侵占了大部分重要城市,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以保护民族利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为军事法制建设的最高原则,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军事法规,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是依法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参与抗战,挽救中华民族,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建立了“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三三制”政权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的具体形式,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健全党领导军队的指挥体制。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权问题上与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指挥权。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党的领导的加强,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8]92},以后又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部队。1940年5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军队中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正是因为从抗战初期起,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和紧紧掌握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始终依法坚持“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确保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是坚持整肃军纪、从严治军的建军治军思

想。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对军队正规化建设和纪律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1941年党中央在《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游击队只有向正规军发展,才能发挥它的伟大作用,严防一切新部队在发展初期的过分浪费、贪污腐化、破坏纪律、脱离群众的现象。为此还颁布了《军队纪律条例(草案)》《内务条令(草案)》等法规,为人民军队在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证。审判黄克功案就充分体现了整肃军纪、从严治军的思想。我军正是靠严明的组织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克敌制胜的有力保证。

五、结语

人类历史上最惨烈也最辉煌的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已整整70周年,至今全世界仍在分享战争胜利带来的法治进步和总体和平的成果。但也要看到,那场罪恶战争的阴影依然没有完全散去,国际社会仍无法彻底阻止战争行为。

实践证明,人类文明的进步来自于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与积极正视。人类对于付出巨大牺牲的历史事件,是不会轻易忘却的。“二战”那段历史虽已经终结,但反思仍需继续。面对强权和邪恶,人类必须选择并依靠法治。因为法治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秩序与正义的共同愿望,它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法治还能驱除战争阴影,清算战争罪恶,恢复因战争而被践踏的国际公理和正义,唤醒因战争而被摧残的人类善意与良知,法治是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 [1][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3]毛国辉.信息时代战争法理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 [4]盛红生,肖凤城,杨泽伟.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 [5]付征南.纽伦堡审判:正义的胜利[J].环球军事,2011(20).
- [6]方宁.二十世纪军事法制的发展及其启示[J].中国军事科学,2000(2).
- [7]陈学会.军事法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8]丛文胜.人民军队法制建设八十年[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习裕军]